

长征口述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出版集团

158位老将军老前辈的传奇故事
浓缩了人民军队战斗历程的生动画卷

国防大学出版社

口述长征

卜金宝 编著

国防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20 号

责任编辑:卜延军

封面题字:申万胜

封底题字:李有来

封面设计:李 戎

留住历史(上、下)

卜金宝 编著

出版发行	国防大学出版社
印 刷	北京凌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大32开·印张:17.5 字数:40万字
印 次	2007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红山口甲3号

邮政编码:100091

统一书号:55626·443

定价:66.00元(上/下)

长征感悟(代序)

在20世纪30年代,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在雪山草地上,在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中,书写了人类史上最壮丽最动人心魄的篇章。这个群体就是中国工农红军,这个壮举就是两万五千里长征。在上个世纪中,没有什么比红军将士的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地影响中国前途的事件了。

一个时期以来,我聆听了多位老红军讲述长征的故事。言犹在耳,感触颇深。一言以蔽之:长征是一部博大的历史教科书,它告诉我们许多的道理。

历史性选择。历史选择了毛泽东。遵义会议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把党的路线转到了正确轨道上来。1930年参加红军的军委原副主席张震上将在人民军队里长大,经历了许多艰难曲折的历程,是我军许多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他动情地讲到:正确的战略指导是红军从挫折走向胜利的关键——遵义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及长征初期红军受到损失的教训,纠正了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是历史的选择,使中国革命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得以转危为安。

90岁的国防科大原副校长张志勇将军的经历也佐证了这一点。当年红四方面军南下时,张志勇任红九军25师74团作战参谋。他回忆南下百丈镇的惨败教训,沉痛地讲到:“过去在川陕苏区时,无论是反三路围攻,还是反六路围攻,只要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它就全线溃退。而这次敌人是越失败越是集中兵力要同我们决一死战。四川军阀刘湘集中了十几个旅对我集结在百丈镇的红军部队进行包围,与我寻求决战,要拼死夺回邛崃、名山、雅安线上的百

丈镇,打通救援名山被围困之敌的交通要道。因为张国焘南下路线的错误,仅百丈一战,红军就损失近万人。如果当初按照毛泽东同志讲的,北上而不是南下,不会是这样的局面。这个惨重代价宣告了张国焘南下路线的破产,也使我们正确路线的极端重要性有了更加切身的体会。”

坚守信仰。诗人泰戈尔有句名言:“信仰是个鸟儿,黎明还是黝黑时,就触着曙光而讴歌了”。在战争年代身经百战、率部创造了许多模范战例的红军老战士、南京军区原司令员向守志上将说:坚定的信仰,是红军长征胜利的力量源泉,也是我们领会长征精神的一把“钥匙”。否则,很难解释红军将士何以能一次次超越人类生存的极限,跋山涉水,爬冰卧雪,笑傲雪满千山鸟飞绝,创造人间难以置信的奇迹。回忆起当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时,将军十分感慨:“我人生的旅程已经越走越远,但记忆依然清晰。往事并不如烟,我走上人生道路和革命征途认识的领袖、首长、良师、战友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一场场血与火激战的枪声炮声军号声常在耳边回响,和平年代的沙场点兵枕戈待旦的日日夜夜永难忘怀。”

96岁的开国中将、原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一语中的:没有信仰的军队只能是一盘散沙,不可能有战斗力!曾思玉16岁参加革命,参加战斗无数,历险几十次。正如他自己所说,“想当年,多少次在敌人的嗷嗷追杀中奋力脱险,在坠落悬崖的瞬间幸免于难,在冰雹肆虐的大雪山上探险带路,在日寇的梳篦‘扫荡’中突出重围,在与敌人厮杀中夺取生路,在茫茫浓雾中误入敌阵,在抵近侦察、靠前指挥中屡遭不测,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下面转移出去……”“如果没有对革命事业的信仰,不可能走到今天。”对此,当年张学良感到不解:“我们都是带兵的,这万里长征,你们谁能带?谁能把队伍带成这个样子,带得都跟你走?”而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解决了。

勇者胜。各路红军主力由长征之初的20.6万人,减少至长征结束时的5.7万人。任何人都会从这个数字中看到,为了人民的利益和革命事业的胜利,英雄的红军将士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和牺牲。黑格尔说:“历史题材中有属于未来的东西,找到了,作家就永恒。”在

长征这一历史题材中,属于今天和未来的,就是不怕艰苦、不怕牺牲的勇敢精神。开国上将洪学智的夫人、红军女战士张文对此体会尤为深刻。长征开始时,她所在的被服厂共有六个班、100多人,长征走到八里铺时,只剩下两个班。许多老大哥、老大姐都倒下了,有些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她自己也曾三次历险,但硬是挺过来了。她说,“艰苦的环境把我锻炼得勇敢起来,坚强起来。这是我最宝贵的财富。”

率先垂范。红军的所向无敌哪里来?是指挥员和干部的率先垂范带出来的。济南军区原司令员饶守坤的传奇故事就是例证。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饶守坤就在红军著名领袖方志敏麾下,为保卫赣东北根据地冲锋陷阵,从普通士兵一直干到闽北红军独立师第二团团长、分区司令员,为革命事业屡建奇功。他单刀赴会,只身进入山大王的“虎穴”。面对如临大敌、摆列成阵的大刀会徒,饶守坤镇定自若,对山大王晓以利害,促其和红军友好相处。这种勇敢的品格,在红军指挥员中具有普遍性。红军部队作战时,指挥员喊的必是:“跟我上!”据不完全统计,在长征中,红军营以上干部牺牲430余名,其中师以上干部80余名。相反,国民党部队的军官贪生怕死,在战场喊的则是“给我上。”这样的两支军队交战,枪声未响,胜败已见。

上下同欲。关心爱护部属和士兵,历来被高明的将帅视为治军的信条。红军长征为什么能够胜利?蒋介石为什么失败?其中一个缘由:湘、桂、滇、黔、川各路军阀心怀鬼胎,同床异梦;红军则上下同欲,万众一心。原武汉军区副政委、中共西藏自治区第一书记任荣同志回忆长征经历时,十分动情。老将军说到,第一、二次过草地,都是在我最危险的时候,同志们救了我。我能够活到今天,是革命队伍同志间互相帮助的结果。老将军的结论是:红军虽然弱小,但生死与共,团结友爱,因而有凝聚力。此言可谓入木三分。从“三湾改编”起,毛泽东同志就为我军规定了“禁止打骂士兵”、“废止肉刑”、官兵平等的制度,确立了人民军队完全新型的内部关系。在长征的路上,为背战友而自己倒下;过草地时,为救助陷入泥沼的战友,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样的事情在红军队伍中比比皆是。87岁

的江苏盐城军分区原司令员丁德山在长征途中为李先念当勤务兵,不但自己倍受李先念的关怀,还亲眼目睹了李先念用战马救助伤病员的许多细节。丁德山说,“我只是在李先念身边工作了一年多,他就一直关心着我,甚至连婚恋的事情都替我操心。”丁德山感慨道:“这样的上下级关系,这样的军队,怎么能没有战斗力?”

以正合,以奇胜。红军长征从被动走向主动,就在于摆脱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从战争的实际出发,开始了战争实践的创新。正是在这种创新的实践中,毛泽东演出了一幕幕用兵如神的战争活剧。东海舰队原政委戴润生将军回忆在长征途中听毛主席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情形时说:毛主席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时说,我们未继续发挥我们历次反“围剿”中诱敌深入、集中兵力消灭敌人的有效战法,而是实行单纯防御,构筑堡垒,幻想不丢失一寸土地,御敌于国门之外,与敌人拼消耗。毛主席把这比喻为“教化子与龙王比宝”,他说:蒋介石占有全国的物质资源,我们怎么比得过他,输的当然是我们。毛主席用通俗易懂的比喻,深入浅出,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及红军长征初期所遇到的困难和遭到损失的原因讲得非常透彻,给部队教育极深。

预则立。实践证明:战争准备工作越充分,取胜的把握越大。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詹大南将军回忆直罗镇战役的情形时说,当时为了打好这一仗,彭德怀司令员亲率团以上干部去看地形。他比其他人都早到集合点。他领着大家在直罗镇东、南仔细地勘察了许多山头,对每个重要地方都作了指示。部队根据他的指示做了充分的准备,为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都过去70年了,将军对当年彭德怀的教诲仍然记忆犹新。

师出以律。《周易·师第七》讲到:“师出以律,失律凶也。”古今中外的军事家都十分注意从严治军,但唯有人民军队的纪律是建立在自觉基础之上的。90岁的老将军、原军委工程兵副政委刘月生回忆自己的亲身经历时讲到:“1934年12月17日,我带一个组在桃源县城一土豪家查抄出一个长条形板袋。这个板袋里面是金银。有人要求拆开‘见见世面’。我毫不含糊地说,原封不动地上交!”为什么?因为红军纪律是铁律,违反不得。我军纪律严明,连蒋介石也

不得不承认。蒋介石在总结国民党失败的教训时曾说：“我们部队的情形，各长官嫖赌吃喝，无所不为。尤其是赌博一项，相沿成风。共军的纪律那样严肃，而我们的军纪如此废弛，试问这样的军队，怎么能不被敌人所消灭？”

.....

伟大的红军长征，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胡锦涛同志强调，我们继承和发扬红军长征的光荣革命传统，就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境界；就要大力弘扬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崇高精神，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精神支柱；就要大力加强全党的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最广泛地为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凝聚智慧和力量；就要大力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人民军队历史使命；就要大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更好地担当起执政为民、执政兴国的历史重任。我们这支队伍是从雪山、草地走过来的，我们现在所走的道路是长征路的延伸和继续。长征的伟大胜利，鼓舞着一代又一代革命军人，不断创造新的辉煌。我们是红军的后代，我们要继承红军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光荣传统，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人民军队历史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新的贡献。

编者

2007年7月

目 录

长征感悟(代序)	(1)
张 震:艰苦卓绝长征路	(1)
李 立:为毛委员当“联络员”	(14)
谢振华:人不能没有信仰	(19)
向守志:三军会师尽开颜	(23)
任 荣:三过雪山草地	(29)
丁德山:为李先念当勤务兵	(36)
刘 坚:15岁“女伢子”的长征	(40)
闫捷三:听毛主席传达遵义会议精神	(42)
戴润生:毛主席写信找“坐骑”	(46)
张 文:三次历险	(49)
张文清:为毛主席做八角帽	(54)
张宜步:自创战歌鼓士气	(57)
顾永武:不让一个战友掉队	(60)
颜文斌:救命的炒面	(63)
叶荫庭:打落第一架敌机	(67)
曾思玉:陕北有红军	(70)
王儒云:铮铮铁骨	(74)
田启元:毛主席指点我烧炕砖	(77)
李盛礼:长征路上多磨难	(80)
邹新民:掩护 17 勇士抢渡大渡河	(83)
杜义德:亲历会宁会师	(86)
孔庆德:“朱毛”不可分	(89)
李中权:一家人的长征	(92)
陈绍清:要桥不要命	(95)

邹 衍:艰难翻越夹金山	(98)
天 宝:披着袈裟当红军	(100)
伍生荣:“红小鬼”在走出草地前倒下	(103)
康立泽:亲历红军三次会师	(106)
罗元发:掩护中央纵队过湘江	(111)
赵 新:有勇有谋夺胜利	(114)
刘月生:红军纪律是“铁律”	(117)
饶守坤:智斗“鸿门宴”	(122)
陈志万:为遵义会议站岗	(126)
陈诗林:为周副主席冒死取药	(128)
范朝利:不可动摇的根本原则	(130)
方 强:和毛主席的友谊	(133)
贾若瑜:红军藏胞一家人	(140)
罗名榜:逃出虎口寻红军	(143)
欧阳平:有一口气就要跟部队走	(147)
张 斌:只能咬牙挺住	(150)
黄英夫:在“挎包大学”成长	(152)
叶 冰:运粮跨越剑门关	(154)
鲁世贵:见到“老乡”朱老总	(157)
李永悌:不该发生的事情	(159)
张志勇: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161)
王贵德:战马见证官兵情	(166)
裴周玉:打烂“坛坛罐罐”	(168)
张 毅:跟李先念政委过草地	(171)
陈金钰:力量源泉	(174)
潘 平:最后一份“救命粮”	(177)
李文模:铁锁桥遇险	(179)
颜吉连:理想之火	(181)
杨国喜:草地之旅	(184)
邓才文:活着就要走下去	(187)
杨永松:不能这样倒下	(189)

郝 毅:救命之恩	(192)
杨光明:红星在我心中	(194)
李国策:九死一生	(196)
周 龙:一缸水煮青稞	(198)
黄海云:一块“牛皮”过草地	(200)
唐荣华:聆听朱总司令的讲话	(203)
汪建英:我在南方走“长征”	(205)
绍 云:归 队	(207)
王家树:生死关头	(209)
彭金山:为毛主席当电话员	(211)
周天浩:大娘救了我一命	(213)
胡继成:红军伤病员生存的 273 天	(215)
彭施鲁:抗联的艰难岁月	(218)
钟 明:一颗子弹打穿头竟然幸存	(220)
周克柳:死而复生	(222)
卢堂胜:湘鄂赣边三年游击战断忆	(224)
赖清林:红军回民一家亲	(226)
杨思禄:绝处逢生	(228)
张秀龙:“铁匠”将军	(230)
黎东汉:枪林弹雨找电台	(232)
吴忠泰:军政委血洒长征路	(234)
宋维栻:最难忘的一页	(237)
吴瑞山:往事如烟	(240)
詹大南:击毙牛元峰	(245)
张力雄:长征最后一仗	(251)
卜金宝:抢救历史	(253)
后 记	(260)

张 震

艰苦卓绝长征路



1993年12月,张震同志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

人物档案:张震,湖南平江人,1914年10月生,1926年投身革命活动,193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7月参加工农红军,10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红军时期,任团宣传队长、连政委、营长、团参谋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区参谋长,总参作战部部长,24军代军长兼政委,军事学院副院长、院长,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75年以后,任总后勤部副部长、部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防大学校长、校长兼政委。1992年10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中共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二届、十四届中央委员。1985年、1987年被选为中顾委委员。

黄老带我长征

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最后一仗驿前战斗中，我负了伤，加上发疟疾，不得不去后方医院疗伤养病。

一天，我师政委黄克诚来看望伤员，一见面，就指名要我跟他回前方。我的伤口在化脓，担心拖累部队，有点犹豫。黄政委的口气不容置辩：“你的脚能走，回前方也能养好伤。”许多重伤员都十分羡慕我能回部队，医院副院长方圆等同志一直送我们到村口，还嘱咐说：反攻胜利后，别忘了给送些胜利品来。后来听说，红军主力走后，医院被敌人打掉，医院的同志和伤病员都牺牲了。

我跟黄政委到零都赶上了部队。回到红3军团第4师10团。团长沈述清、政委杨勇见我伤未好，便留我在团部当作战参谋。部队正忙于补充兵员、弹药、刺刀、棉衣。原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各路敌军加紧向我中心区推进的严重形势下，已决定撤离中央苏区，到湘西去同红2、红6军团会合。由于这个决定极端保密，我们这些基层部队的同志只听说要进行“反攻”，根本不知道要放弃中央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过去，我一直认为黄克诚同志是师政委，他可能知道部队要走的情况，才到后方医院接我们。近年翻看黄老的《自述》，方知他当时也不知真情，而是从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文章中判断的，实在难能可贵！人到晚年，易思往事。我想，当年如果不是黄克诚同志把我从医院里接出来，带我走上长征路，哪里还会有今天！

突破四道封锁线

长征开始的一个半月里，主要是突破敌人设置在我们前面的四道封锁线。第一道封锁线在江西信丰地区。我们同兄弟部队共同奋战，攻占了新田、古陂，西渡桃江，突破了敌军的封锁线，但损失也不小。洪超师长就牺牲在这里，他大我5岁，是我们红3军团最年轻的师长，英勇善战，胆识过人。记得那一天，部队向白石圩前进。洪超师长带一个排从我们团出发到前卫11团去。刚离开不久，就遭到溃散之敌的偷袭。我们听到枪声，急忙上去支援，但师长已

经中弹牺牲。大家怀着满腔悲愤，全歼了这股残敌。洪超师长牺牲后，由张宗逊接任第4师师长。

突破湘南地区的第二、第三道封锁线时，我发着高烧，不能走路。沈团长、杨政委对我的伤病非常关心，强令我坐担架。一星期后，伤口稍有好转，我就坚持步行，跟着部队向前走。

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最为惨烈。我第4师部队血战湘江，付出了重大伤亡。我这时伤病已愈，又回到3营当营长，率部坚决扼守光华铺地区。一天之内，沈树清、杜中美两任团长都牺牲在这里，全团伤亡近半。指战员们的鲜血染红了湘江，终于完成了掩护中央机关和军委纵队在界首渡江的艰巨任务。从整个战役讲，中央红军苦战5昼夜，总算突破了敌军的第四道封锁线，但部队已由江西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联想到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的被动局面和重大损失，大家的心情都很忧虑和沉重，为什么毛主席还不来指挥我们？

转战湘桂黔

红军渡过湘江后，蒋介石急令桂军尾追、黔军西堵，企图围歼我军于北进湘西途中。如何摆脱敌人尾追是战略指导上的关键问题。

我们翻过越城岭，进入广西龙胜县境。这里居住着苗、瑶、侗等少数民族。敌人到处造谣，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老百姓不知真相，都逃到山里去了。桂军挑选熟悉地形、民情的老兵，以班排为单位，与当地民团合为一股，潜伏在山上，侧击我行军队伍。当我们追上山时，他们很快就跑了；我们一下山，他们又跟着回来，继续向我们射击。我们只好边打边走，前进速度十分缓慢。

在这样的村寨里，红军十分强调遵守群众纪律。用了群众的粮、菜，都留下银元，写好纸条，说我们是工农红军，路过此地，用了你家的东西，现付给你银元，因主人不在，无法面商，实在对不起。早晨离开宿营地时，都将院落打扫得干干净净。有几天，部队刚离村，竹木制造、盖着树皮屋顶的房子就着了火，马上返回扑救，但已来不及，大家心里也纳闷。后来，我们派出潜伏哨，捉住了几个放火的国民党便衣特务，经过公开审判，揭露其破坏红军同群众关系的



1981年3月,张震同志重返安顺场,与当年红军抢渡大渡河时的老船工合影。

罪恶阴谋。群众明白了真相,便纷纷到山里叫回亲友,有的还要求参加红军。

在广西境内走了10多天,直到进入湘西南的通道县一带,才摆脱了桂军的纠缠。12月上旬,红3军团奉命整编,我又回到10团司令部任侦察参谋。没多久,红军突然改道,向黔北方向前进。后来才知道,当时敌“追剿”军主力已在我军前方构筑工事,张网以待。但博古、李德仍坚持原来同红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是毛主席力主放弃这一会使红军陷入绝境的方案。中旬,中央政治局又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肯定了毛主席的正

确意见。

蒋介石得知红军入黔，大感意外，急忙调整部署，继续追堵，企图围歼红军于乌江南岸。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在敌重兵到达之前抢渡乌江，向遵义前进。我红3军团经台拱（今台江）、黄平、瓮安，向乌江急进。一路上，我们10团是军团的先遣团。我带领侦察排，先行过了清水江，抵达桃子台，前出乌江南岸，侦察渡河地点。乌江是贵州最大的河流，素有“天险”之称。江面宽200多米，水深流急，两岸悬崖绝壁，难以攀登。由于我们行动快，蒋军主力还未到，江边只有黔军几个团防守。1935年1月5日，当大部队到达茶山关渡口时，守敌已逃之夭夭。因为红1军团已夺占回龙场等渡口，并架设了浮桥，所以，我们团顺利过江，红3军团其他部队也在第二天渡过。

过了乌江，在遵义以南的懒板凳（今南白镇），红3军团又进行了整编：4师、5师保留，6师缩编为一个独立团。4师师长、政委还是张宗逊和黄克诚，我们10团团长为陈连华，政委还是杨勇。

为了解贵阳到黔西一带敌人的活动情况，陈团长、杨政委派我带侦察排到黔西去侦察。在离乌江上游的鸭池河西岸约40里的甘棠镇，找到了一位忠厚的长者，请他当向导，南渡乌江。我与他商定了行进顺序：由他带着伞走在最前头，相距百把米是便衣手枪班，再往后是我带的一个机枪班和两个长枪班，约定如发现情况，就立即张开伞。结果一路未有敌情，我们顺利进了黔西城。

城里人很多，生意兴隆。长征以来，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热闹的场所。突然间，我发现街上有国民党中央军贴的标语，走近一看，有的浆糊还没有干，即问当地群众，他们说中央军在此过了两天，今天早上才过完，往刀靶水方向去了。开始我不大相信，刀靶水是我5师守备的，在乌江北岸、通往懒板凳的大路附近，看来敌人已经行动。我们急速返回，部队已经开拔。陈团长、杨政委给我留了一封信，说情况有变，目标遵义，要我迅速赶上。我带领侦察排插小路向遵义方向追去，赶上团部并简要汇报了侦察情况。原来，国民党中央军已渡过乌江，追了上来，我5师在刀靶水遭敌袭击，受到一些损失。敌人在步步逼近，我们边打边走，来到了遵义。

在此期间，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及长征初期红军受到损失的教训，纠正了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屡经挫折之后，作出的历史性选择，使中国革命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得以转危为安。遵义会议还作出了渡江长征，到川西或川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定。当时，我们这些基层干部并不知道会议的精神，大约到云南扎西（今威信）地区后才听了传达。大家精神为之一振，联想起第五次反“围剿”苦战一年，处处碰壁，湘江战役中，如此被动挨打，牺牲了多少红军干部战士，原因到底在哪里？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积在我们心头一年多的疑团解开了，感到红军有了希望，革命有了希望。

四渡赤水

遵义会议后，红军准备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这时，蒋介石急令川军在长江北岸构筑工事，全力防堵，同时调集中央军、黔军、桂军、滇军共约40万兵力，企图将我军围歼于贵州境内。

我中央红军此时只有3.7万人，如何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迅速北渡长江，是为至要。1935年1月19日，红军离开遵义向土城、赤水前进。在土城，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参战部队营以上干部会议，我也参加了。会议由洛甫（张闻天）主持，朱德总司令作了作战动员。28日拂晓，我师在土城东北的青杠坡与敌教导师接触，双方展开激战，直至中午，敌人越打越多，我的腿被炮弹片划伤，杨勇政委也负伤了。到底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是情报不准。敌军远远不止我们原先判断的3个团，战斗力也比王家烈的“双枪兵”要强，再战下去对我军十分不利。于是，中革军委果断决定撤出战斗。

29日，我们团随军团直属队，从土城浮桥过了赤水河。在此前后，总部和其他部队也渡河西进，从而改变了原来的作战计划，开始了有名的“四渡赤水”之战。为轻装减负，彭德怀军团长下令把山炮拆散沉入河中，反正炮弹也打光了，部队向四川古蔺、叙永方向疾进，准备在泸州、宜宾间伺机北渡长江。